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6
湖南

HUNAN WENSHI

文史

42

199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
42
辑

湖南文史

周谷城题

湖南文史杂志社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42辑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编/田伏隆

副主编/丁江 高原

责任编辑/彭德才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湖南省长沙市迎宾路15号)

发行/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80,000 印数12,000
版次/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长沙第1次印刷

国内统一刊号 CN43—1175

定价/2.5元

湖南文史

19291

目 录

(总第42辑)

伟 人 风 范

忆父亲毛宇居与毛泽东的情谊……………毛远涛(1)

回忆高文华二三事……………李 莹(7)

革 命 史 话

回忆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周 里(12)

解放前夕攸县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攸县人民警卫大队的建立和发展……………贺湘楚(21)

回忆南岳黎明前的地下斗争……………欧阳镇 旷 炯 董建华(29)

我在解放前的一段革命经历……………谭一天(41)

告别故土 奔赴新区

——数千冀南干部南下湖南纪实……………赵 畅(46)

2A39/06

七十年湖南统战工作述略……………何醒初 唐伯固 (60)

烽火忆往

抗战时期印缅战场上的一支中国坦克部队……………孙志明 (80)

从湖南出发——兰姆伽改编——列多集结——进入野人山
——鏖战瓦拉那——强度南三河——沙地亚整训——“第
二条战线”——乘胜追击——战车兵节

记宁乡杜家山抗日阵亡将士……………张祖骞 (91)

湘籍民国将领

李明灏将军与黄埔军校二分校……………刘冬松 (94)

国际军事情报专家杨宣诚……………黄曾甫 (99)

我所知道的肖作霖将军……………陆印泉 (106)

中国文化学会——创办内外杂志——北战线《阵中日报》
——办经纬出版社——南京的《大通报》——追随程潜
起义

回忆陈采夫将军……………肖汝贤 (124)

湘籍文化人

我的父亲钱歌川……………钱宁辉 (129)

革命回忆录

“归去苍凉”

- 康濯逝世前后 张 扬(132)
- 台湾名教授许君武先生传略 许诒博(140)
- 赵启霖传略 易孟醇(144)

军 事 史 料

- 蒋介石长沙阅兵与唐生智反蒋 张季任(149)
- 讨赵湘军第六军战斗见闻 田士清(153)
- 回忆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 高中凯(159)

文 坛 旧 事

顶风斗雨向太阳

- 记劲草社和《孩子的世界》 放牧 郁青 若文(167)

往 事 钩 沉

- 回忆留俄始末(1926—1928) 肖 范(180)

启程赴苏——旅途花絮——进入中大——优厚待遇——多
边型的学习——党派闹中大——恶浪荡苏联——群雁汉关
飞——傲骨斗严寒

徐君虎智斩祸首谭式文(192)

五十年前湘西历险记谭天萍(199)

建 国 后 史 料

回忆我的右派生涯周守忠(206)

打入另册——羞归故里——风雪边城——归去来兮

忆父亲毛宇居与毛泽东的情谊

毛远涛*

1959年6日，毛泽东主席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来到毛震公祠，对里面过去放祖宗牌位的地方鞠了三个躬，而后对身边的一位银须飘拂的老人说：“1927年元月，你们在这里集会欢迎我。”那位老人诧异地道：“主席，你还记得？”毛泽东笑着说：“怎么不记得呢？你当时还在欢迎会上致词哩。”

“是的。”老人抚着银须，琅琅背诵起来：“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毛泽东听着，爽朗地笑了起来，那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情景仿佛浮现在眼前。他转身对陪同他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介绍说：“我1927年元月在韶山考察农民运动，他们曾在这里欢迎我作报告。”老人连忙朝罗瑞卿点了点头，说：“主席的记心真好！”

这位老人，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堂兄及幼年时的塾师，我的父亲毛宇居先生。

父亲派名毛泽启，号宇居，亦作禹居、蕊珠，别号“守一子”，又号“韶麓散人”。家住湘潭县韶山冲菜家塘（今属韶山市）。生于1881年（光绪七年），卒于1964年9月29日。他比毛泽东长13岁。他的曾祖父毛南方（我的高祖父），与毛主席的曾祖父毛四端系嫡堂兄弟；我的祖父毛福生与主席的父亲毛顺生系五服内堂兄弟。我们家与主席一家，来往密切。

*毛远涛，湖南韶山人，毛宇居之子，现任株洲南方动力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经理、经济师。

父亲过去攻读古书较多，善于写作，人称他为“韶山一支笔”。解放前，他基本上以教私塾为主要生活来源，因而与当地交往较多，深受大家的尊敬，也曾与少数上层人士有往来，这也完全是为了应付门面。1940~1941年，他曾主持修纂了《中湘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并为族谱书写了序言，目前该谱存放在旧居陈列馆。为了生活和出路，他曾奔走他乡，并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生活清贫、忧心万千的情绪。诗曰：

“马牛生活我生忙，漫走川滇觅稻粱。鹤守残梅撑傲骨，雁飞中泽馨中囊。关怀群侪多摩擦，话到和平费考量。世事沧桑从变化，祇愁书味不留香。”他为人耿直，通情达理。他在1941年重阳节，给侄儿毛远翔的一个笔筒上题词道：“外象园，内象空，园而且空，是之谓玄，同竹君子能如此，宜其明体达用而无所不通，吾今以此为师兮冀，朝夕瞻仰以磨砢，又岂得小之日笔筒。”

由于他和毛主席有着亲密关系，所以他对中国革命斗争十分关切。抗日战争时，我就看到他从事地下工作者手中借阅过寒主席的《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等著作。1945年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到湘潭时，父亲曾多次到南下的堂侄毛远翥谈论时局战争，并询及延安和毛主席的情况。

解放后，父亲可以说倾注全力，向来韶山的客人介绍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和生活，称赞他的才华和反叛精神。1950年他曾系统地向当时的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李锐介绍了毛主席少年时的情况。尽管他在认识上不能完全摆脱旧的观念，但对来访的中外客人总是感到欣慰、高兴，并予热情接待。他在72岁高龄时，特地写了一首诗：“南岸茅庐主席家，风光尤是朴无华，往来过客人言籍，此地频开革命花。”“有询先世事如何，木石居今去壤歌，积厚流光越时代，发扬光大起山河。”可见，父亲对主席的爱戴之深。

父亲和毛主席之间，不仅有着师生情感，更有亲如手足的兄弟之谊。由于他在韶山冲属于文化造诣较深的一个（主要是古书、诗词等），毛主席幼年曾就读于他门下。毛泽东幼年时渴望求知，酷爱“杂书”，父亲故意点一些深奥的古书，如《诗经》、《春秋》、《左传》之类，让毛泽东背读，他都能应付裕如。因此，尽管他就读时间不长，父亲就十分钦佩主席的才华。不仅如此，主席还能以经书作武器，对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据说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老人，经常责骂他“不孝”，他针对父亲粗暴和刻薄的特点，对父亲说“父慈子孝”是经书上讲了的，可见“父慈”在先，“子孝”在后，哪有父不慈而子孝呢？弄得他父亲无言对答。1910年毛泽东要求去湘乡东山学堂继续读书，受到他父亲毛顺生的阻止，我父亲曾极力在顺生老人面前劝他送子读书，并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读书的天资非同凡俗，终于获得了顺生老人的同意。同年秋天，毛泽东便去了东山学堂就读。

父亲冒着危险，珍藏了有关毛主席的不少文物。较突出的有三点：一是1919年主席的母亲病逝时，主席沉痛地写了《祭母文》及挽联，交给我父亲保存。父亲历经艰险，妥善保存，直到解放时才交给人民政府。二是大革命时，国民党反动派派人来挖毛主席家祖坟，企图挖断他家的“龙脉”。我父亲知道后，先是组织家人将毛主席家的祖坟铺平，同时栽了两棵森树，以作标志。国民党抓到我父亲，逼他带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便将他们带到滴水洞口边，往左边一转，上了龙头山，结果挖了一座地主家的祖坟。三是收藏了1938年5月26日毛主席给我父亲的复信。信云：

宇居兄左右：

五月十日信收到。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

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

此复。即颂
时绥！

弟 毛泽东

为了防止国民党军警的搜查，这些手稿，父亲都是放在墙壁缝隙中保存下来的。此外，他经常照看毛主席旧居，还常对毛楚雄及周外婆（毛泽覃的岳母）给以照料，确是按照主席的嘱咐，“看成一家人”。毛楚雄在1944年前后，也在我父亲门下就读。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他便常向有些人介绍：“这是当代伟人毛泽东的侄儿。”更为可贵的是，父亲与毛国翘等人主持修纂《毛氏族谱》时，曾在“毛泽东”的条目下写了“闾中肆外，国尔忘家”八个字，在“毛泽民”的条目下写了“琳玠齐名”四个字。虽然寥寥数字，但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熠熠光彩。

解放后，1949年10月他给毛主席写信，不久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主席在信中表达了他对家乡父老乡亲的关心和问好，信云：

禹居家兄：

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当可面达。顾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人们的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回到韶山，一下车就向身边的人说：要把我大哥接来。当时也把我母亲和妹妹接到了宾馆，受到了主席的亲切接见，并照了相。我父亲还陪主席视察了家乡

的田园生产，一路上谈笑风生。主席在游泳时，见他站在岸上，便问题：“你怎么不下水？”他答：“主席，我老了，不能游。”主席风趣地说：“你坚持锻炼，游一次，起码多活20年。”逗得大家都笑了。晚上，主席设便宴招待乡亲们。大家坐定后，他端起酒杯，向我父亲敬酒，我父亲连忙起身相迎，感谢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主席当即回答：“敬老尊贤，应当应当。”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深挚的感情。

解放后，我父亲曾三次到北京。

第一次是1950年9月，是由主席派人直接送信到我家的。他们阔别几十年后，相见十分亲切，主席握着他的手说：“来客啦，来客啦，快请坐。”并向他询问了家乡的情况。当天在主席家吃饭时，主席将儿子岸英、李敏、李纳等兄妹叫到跟前，向父亲一一作了介绍，并对他们说：“这是从韶山来的，是你们的伯父。”这次主席还安排我父亲和他参加了国庆一周年观礼和宴会，陪他参观了名胜古迹，又派员陪我父亲乘飞机观看了占长城。因父亲是第一次从南方到北方，主席又为他买了皮大衣，皮鞋等；看他牙齿不好，又为他全部换了假牙。

第二次是1952年冬，韶山小学要扩建，父亲受家乡委托，专程进京，请主席题写校名。到京后，他汇报了情况。主席十分高兴地说：“这好，现在需要人才，教育要发展。你是教书出身的，要多出力，还要教育人家多出力。”当提到写校名时，主席说：“写什么名字好？”父亲说：“我们只是办小学，就写韶山小学吧！”主席想了想说：“为什么硬要叫小学呢！将来学校可以发展，可以办中学、大学嘛！还是叫韶山学校好，这样一次不就写全了？”随即写了几张“韶山学校”校名，供家乡人民选择。这次父亲到京曾多次在主席家吃饭。有次吃完饭，主席兴致勃勃地说：“今晚我们回韶山，看看你自己吧！”实际是在主席家看了一场电影，片名是《解放了的中国》。这

部电影是在苏联帮助下拍的我国第一部彩色片。该片的部分镜头是在韶山拍的外景，多处有父亲镜头。

第三次是1958年8月。时当湘潭大学正在筹办当中，父亲受县委之托，又一次赴京请主席题写校名。抵京后，开始住在前门的“惠中宾馆”。主席知道后，即派人接他安排在和平宾馆宿食。他详细向主席汇报了办校的筹备情况和来意，主席询问了筹备及办学的很多问题后，说：“近年来许多人请我写字，我都未写，我的字写得并不好。我小时读书的东山学校，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也未写，假如给你们写了，他们不会有意见吗？”父亲说：“这个问题好办，你写两张。东山学校一张我替你送去，两县人民不就都没有意见了吗？！”主席笑了笑，就答应了。过了几天，他秘书将主席亲笔题写的两纸校名及一封信便函送到和平宾馆，交我父亲带回。信函云：

宇居兄：

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两纸，请转致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一纸，亦烦转致。

毛 泽 东

九月十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虽然日理万机，然而他对他们的师长和家乡人民仍然关怀备至，情意深长。这对我们后代是一种深刻的教诲、巨大的鼓舞。

回忆高文华二三事

李 鳌

高文华同志原名廖剑藩，是湖南现存的少数最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是广大党员衷心敬爱的领导人。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解放初期任省委副书记。我是他领导下的一名小兵，几十年来与他保持着相当亲密的关系。本文所忆述的，是我和他接触中了解和感受到的一些事情。

我认识高文华同志，是1937年下半年在延安中央党校。他先到那里，编在第五班；我后去，在第十班。当时他化名赵诚学，我改名李占先。我们见过面，谈过话。不久，他就离开了党校。1938年2月，我被分配回湖南。长江局写的介绍信是“面交高文华同志”。一见面，原来是熟人。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益阳人。因为我的未婚妻赵耀南（德坤）是益阳人，他要我利用这个关系到益阳去开展建党工作，还谈了益阳的一些情况，交待了工作任务。我于3月上旬把未婚妻叫到长沙来，我们结了婚，一同去到益阳。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不久益阳县委成立，我被指定为县委书记。我当时是个20岁出头的青年，缺乏领导工作经验。文华同志每隔一两个月就来益阳检查一次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他还利用他自己和他父亲廖若冰老同志的关系，帮助我建立一些社会联系，包括同几个上层人士如老同盟会员曾传范等的联系（与曾老建立关系，对后来促使国民党

• 李鳌，原湖南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文史委副主任，现已离休。

当局逮捕和镇压大恶霸、汉奸曹明阵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华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益阳党的工作获得了比较全面的发展。以后我在邵阳和湘西工作，也都是依靠以他为首的省委的领导。

1937年至1941年这个时期，湖南党的工作由比较顺利变得极为艰难。以高文华同志为首的省委，对这一时期的问题都处理得很好。在条件顺利应该发展时则放手发展；当反共高潮到来，中央和南方局提出“隐蔽精干”的方针后，又积极而稳妥地撤退暴露了或可能暴露的同志，为党保存了大批骨干。

解放初期，高老以省委副书记兼任省工业厅厅长，还一度兼任厅属小厂矿管理处处长。这恐怕是没有先例的。因为他是工人出身，对办工业有兴趣，有经验，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为湖南的工业化打基础的雄心壮志。他办工业的指导思想是：大力发展小厂矿，利用其投资少、周转快的特点，积累资金，然后再搞大型工业。这无疑是一个适合当时湖南具体情况的正确方针。他调我到小厂矿管理处任研究组组长（当时我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任研究室主任），并要我至少给他推荐两位同志（真是求贤若渴啊！）。我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推荐，又不愿随便推荐，实在有负他的重托。我在那里工作了近两年，与高老接触更多。他工作起来，简直是废寝忘餐。有时我们开会，从下午开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叫人端几碗面充饥。他经常到下面检查工作，事前多由我带工作组到拟去的单位作调查研究，然后他下来解决问题。我大略估计了一下，他一年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下面跑。那时交通不便，许多地方不通汽车，他就和我们一道步行。每到一个地方，立即开始工作，常在深夜12点以后才得休息。他的肺结核病初愈，为了把我省的工业搞上去，如此奋不顾身地操劳，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激励。

这段时间，高老给我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他的思想十分敏锐，记忆力特别强。工业厅所属几十个厂矿企业，每个单位多少投资、多少计划任务，以至多少职工，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不须翻笔记本（我从未见他带笔记本），就能准确地说出来。省里定的各项指标，也是如此。这是常人所不及的。

高老调中央工作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也很少通信，但彼此之间的感情并没有淡化。我每次去北京，总要去看望他和贾琰大姐（后来是刘德君同志）。他每次来湖南，也照例约我们夫妇去他住处见面谈谈。几十年来，我经历过不少领导，我对他们都很尊敬，但象我与高老这样始终不渝地保持着私人友谊是不多的。据我所知，许多同志对高老都怀有深厚的感情。

人们为什么对高老如此爱戴？主要是因为高老具有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令人崇敬。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了筹措党的经费，解决干部的吃饭问题，他曾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卖掉。此事已是众所周知，我就不多说了。还有另一桩鲜为人知的事情：1938年高老任湖南省委书记期间，他的母亲在益阳因身患重病，痛苦难忍，加以生活困难，竟至投塘自尽。以高老当时的地位，要设法照顾一下自己的母亲，并不是办不到的，而他一心为革命，根本没有考虑自己家庭的问题，以至造成那个悲剧。事后他也不免感到遗憾。高老具有彻底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真正做到了能上能下。他1935年就是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资格不可谓不老。可是他从不以老资格自居，任凭党把他安排到什么岗位，他都欣然接受，积极工作。高老的这种高风亮节，在世风日下的今天，更觉弥足珍贵。

高老原则性强，对干部既放手使用，又严格要求，发现谁有过错，都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我也受过他的批评。当我们受到批评时，丝毫没有抵触情绪，反而感到是一种爱抚。高老

对于干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在这方面我的感受是特别深的。1938年他母亲去世后不久，当他了解到我邵阳乡下还有一个寡母和三个年幼的弟妹，生活十分困难，而党组织又实在无力给我帮助时，曾深情地对我说：“你自己想点什么办法吧，不要让我家里的悲剧在你家重演。”仅这样一句话，使我感动得流泪了。后来我为桂林文化供应社的青年新知丛书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的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曹伯韩同志在该社当编辑，也是党内同志介绍的），得了80元稿费，解决了家里一段时间的生活问题。1939年下半年我被调到邵阳工作，省委也驻在邵阳。一天，高老约我去他家吃饭，贾大姐弄了一钵子粉蒸肉，我和他们全家都吃得很香。我意识到，这是他知道我生活苦，让我去打一次牙祭。其实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平日是很少吃肉的。还有一次是高老调京以后，我第一次到北京开会，去看望他和贾大姐，在他家吃过饭后，他们拉着我上街，为我的四个孩子每人买了两件衣服给我带回，对我说：“你们孩子多，工资不高，一定有困难，这几件衣服，送给孩子们，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吧。”多么深重的情意啊！从以上几件事，充分体现了高老对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心换心，情还情，我对老领导也不是漠不关心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估计高老可能受到冲击，趁女儿赴京之便，要她去看看高老，问问情况，她先到我告诉她的高老原来的住址（苏州胡同某号）一问，说已经搬了家；再到水产部打听，回答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这就没有办法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听说高老曾饱受折磨，身体很不好，我忧心如焚。直到1981（或1982）年高老偕德君同志来长沙，看到他身体尚健，才感到宽慰一些。

高老和我们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我们对他非常尊重，但没有一般下级对上级的那种畏惧和拘谨，完全是一种平等的、十分随和的同志关系。地下工作时期，我们都把他看作老